

# ——《归来》原著《陆犯焉识》作者怎么看电影改编？ ——是小说家也是编剧，与李安陈冲陈凯歌合作，往事知多少？ 西岸小说，东岸电影：严歌苓如何“倒时差”

和严歌苓约采访，你一定要搞清楚，她与你之间的时差。严歌苓常居柏林，她在那儿的工作习惯是：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4点，关手机，写作。这就意味着，在比柏林早6或7小时(欧洲夏令时实行期，两地时差)的北京，每天下午三四点到晚上十、十一时，你很难打通严歌苓的电话。若等她空闲下来和你聊天，那感觉大约像在电台做“午夜热线”。

所以，5月初的某天，记者听闻严歌苓要在北京待一阵子，赶紧找个“正常时间”向她约专访。这一次，严歌苓回国，大部分原因是张艺谋的《归来》。那几天，她陪着张艺谋，从成都到北京走了几站《归来》的路演。每到一处，小说《陆犯焉识》和电影《归来》，孰优孰劣——这样的话题肯定会抛给严歌苓，而她总会谈起小说和电影之间“容量以及自由度的差别”。的确，《陆犯焉识》用400多页的长度重绘了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家庭的坎坷。对于一部时长100分钟，并且需要在国内公映的电影来说，无论如何改编，两者在创作上的“时差”一定存在。

而在海外旅居近20年的严歌苓，似乎也越来越习惯这种“时差”。1990年，作为小说家和编剧的严歌苓，一直在海外华人电影圈游弋。《少女小渔》《天浴》一个新移民的故事和一个知青的故事，两部作品在海外反响颇大。直到新世纪之后，严歌苓的名字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国内影视剧《梅兰芳》《金陵十三钗》乃至现在的《归来》。她的作品已经是许多国内导演眼中的“富矿”。

严歌苓同华语电影圈已经“纠缠”了20年，可是，她却越来越“纠结”于编剧和小说家的双重身份。严歌苓坦言，写剧本要按照导演的意图走，“时间和创作上都没有写小说那么自由”。但是，每隔几年，总会有一部署着“严歌苓编剧”的电影或者电视剧上映，“原创剧本我还会写，但是让我再改就不要了”。她不想柏林和北京的“时差”被随便打破，因为，“时差”会帮她保持独立和清醒的创作状态。

不过，大部分时间都在写本土故事的严歌苓，似乎很难一直保持这样的“时差”状态。这两年，她出了两部描写当代中国的小说《妈阁是座城》《老师好美》。严歌苓坦言，“中国的当代故事写起来有些费劲……要回国生活一段时间才能找到感觉”。《归来》上映前夕，记者独家专访严歌苓，请她聊聊“在柏林写小说，在北京拍电影”的“时差”生活。

南都供稿

先说《归来》与《陆犯焉识》

电影不如小说？  
“我们的现实就是，小说的自由度比电影大”



由于《归来》的上映，原著小说《陆犯焉识》又被大众热议。

她与华语电影人的“亲密触碰”

“那次的改编有些遗憾……”

记者：这些年来，你的小说创作和电影总是“纠缠”在一起。当年，你的短篇小说《少女小渔》，经过李安和张艾嘉(注：李安监制，张艾嘉导演)改编成电影，反响很好。可以聊聊你跟李安、张艾嘉的那次合作吗？

严歌苓：当时，李安先给我打电话说要《少女小渔》的电影版权。《喜宴》那时刚刚拿了奖(注：第43届柏林电影节金熊奖)，我一听是《喜宴》的导演，特别高兴。我的第一反应是，可以不用做一个特别穷的学生了。那时，我在芝加哥上学，主要的经济来源就是我的先生，我自己也写短篇小说赚些零用钱。《少女小渔》的版权费是一大笔钱，当然很开心。我同李安通了几次电话，谈好怎么改。

记者：《少女小渔》的剧本写了几稿？

严歌苓：我只写了第一稿剧本，就给他们拿去又改了一次。我从来没跟张艾嘉见过面。

记者：从小说到电影，在你看来，《少女小渔》改编得如何？

严歌苓：刘若英把“小渔”这个角色演得很好。但是，我觉得有个遗憾。小说里面，跟“小渔”假结婚的那个老头原本是那种“很垃圾”的人。他是个意大利移民，又是个在街头卖艺的人。只有这样“心术不正又很贪婪”的人才会有冲动跟想留在国外的小渔假结婚。小渔是个非常认真的人，这样的“垃圾”她都没有嫌弃他，而是照顾他。这样的对比才显出小渔的善良和胸怀。但是，在电影《少女小渔》中，那个老头就没有小说里描写得那么“垃圾”，对比没有小说中那么强烈。

记者：李安导演对电影版《少女小渔》的看法如何呢？

严歌苓：后来，李安拍《色·戒》的时候，我去探班。我们俩聊起《少女小渔》，他说挺遗憾的，这个戏不应该在纽约拍，如果是他自己导演，应该会放在悉尼拍。我的小说里面写的就是悉尼，而悉尼和纽约感觉上差别很大。我和他开玩笑，“当然啦，你有更大的戏拍，你自己不拍就给别人去拍”。他听了就在那里笑。

记者：小渔这个角色在你当时的留学生活中有原型存在吗？

严歌苓：有。现实中的“小渔”不傻，而是很精明的人。我在悉尼认识这么个女孩子，是广东人。如果照原型人物的故事拍就更好玩，她跟那个老头斗智，就会像是个大闹剧。

1  
严歌苓+李安张艾嘉  
= **《少女小渔》(1995)**



2  
严歌苓+陈冲  
= **闺蜜电影团**



电影《归来》对小说《陆犯焉识》做了很不一样的改编。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，严歌苓表示：“如果电影跟原著的差异很大，但改得也很好，我也高兴。”在她看来，长篇小说有很多重意义，“不管哪重意义点燃(导演)他的创作欲望，拍出来的电影好看，我当然没什么意见。”而剧本从一开始的主体思路就跟现在差不多，只是一些细节上有改变。严歌苓透露，开拍前，张艺谋给她看过剧本，说“前面几段需要你帮我改一下”。她花了一个礼拜时间修改剧本，最后导演用了一部分。包括陆焉识第一次逃回家，还有女儿丹丹跳舞等等一些细节，出自严歌苓之手。

电影里的陆焉识没有小说里那么丰富的前史，因此有一些“原著党”觉得，这样的改编让他跟妻子的感情显得不够扎实。严歌苓回应，《归来》的容量只有100分钟，把故事的前因后果都讲清楚，不太可能。“这部电影就是一个写意的表现，陆焉识可以跑回来看冯婉瑜(电影里改名为冯婉瑜)一眼，这种感情要靠想象力把没有的地方补白。”她强调，“我们的现实就是，小说的自由度要比电影大一些。”

跟陈冲的交往“很过瘾”

记者：我看你写的《本色陈冲》，感觉不是一本传记，反倒像写的小说，陈冲就是你笔下那些特别有生命力的女主角。

严歌苓：我挺佩服陈冲的。我觉得，很少有像她这样的女明星，出道那么早，长得又那么漂亮，同时能够那么有思想。她的那种自知之明很少见。

记者：你们第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？第一印象是怎样的？

严歌苓：那年，我22岁，陈冲19岁。她哥哥陈川跟陈逸飞关系特别好，陈逸飞跟我爸爸关系又很好。有一天，陈川就带着妹妹陈冲来我爸爸住的酒店做客。那时，她刚演完《小花》。

陈冲很聪明，表现得又很粗线条。当时我就在想，这样一个女孩子，又是得了金鸡奖的女明星，之后还有机会出国留学。在我这样一个刚刚开始写电影剧本的人眼里，她太优越了。但是，她本人曾经跟我讲过，其实她有自卑感。

记者：你们两个人什么时候开始熟起来？

严歌苓：陈冲参演的《末代皇帝》1988年得了奥斯卡奖，1991年，我就搬到旧金山。那段时间，我们俩天天见面。在旧金山，我就她这么一个朋友，两个人天天一起买菜做饭、一起逛街买衣服。她这个人从来不讲人家的长短，反倒对一些国家大事更感兴趣。我跟她的交往很过瘾。她说，要么我就不跟人家交往，要么就是深度交往。

记者：你们俩后来是怎么“捣鼓”出《天浴》这部电影的呢？

严歌苓：我以前在成都军区的时候，那里有一个女子牧马班，我们为了排舞蹈，要到牧马班的驻地体验生活。后来，我就根据这个经验写了一部长篇小说《雌性的草地》。陈冲看了之后，非常喜欢这部小说。我跟她说：“我还有个短篇小说想写”，我跟她说了一遍具体的构思。陈冲觉得这个故事挺好的，不过，她那时还没想着做导演。

过了两年，她去柏林国际电影节做评委。有一天，她从柏林打电话给我，“你给我讲过的那个短篇小说，我觉得比电影节的任何一个片子都要好。我们拍个短片，40分钟的”。我说，好吧。她就问：“李安(买《少女小渔》的版权)付你多少钱？”我说，李安给多少多少钱。她说，“那我就买《天浴》的版权了，我来弄剧本架构……”等她从柏林回到旧金山，已经写完剧本的初稿。那时，我先生刚好出差。我就跑到陈冲家里住下，开始写剧本。三天，两万字，一气呵成。她一看剧本就说，“这是个完整的电影，不是短片了”。

记者：这部影片算是一部海外制作了。

严歌苓：这部电影找到台湾资金投资制作。在香港、美国放映过，当时在纽约的ART HOUSE放了3个月。

记者：之后她买了你的《扶桑》的电影版权，但是后来一直没拍成，为什么？

严歌苓：当时我们也是准备拍英文片，资金也到位了，是一个日本的影视公司。那时，她怀上第二个孩子，已经五个月身孕了。后来，那笔资金转去投资其他片子……

记者：陈冲到现在还对《扶桑》念念不忘吗？

严歌苓：她一直有兴趣，但如果在国内拍，这个题材非常难处理。现在在国外投资艺术片的公司也很穷，资金很难找。